

文艺

如今光伏发电已然成为西藏清洁能源发展的新趋势,横卧于藏北草原上的光伏电站成为西藏的新地标。然而,回望40年前,被誉为“太阳的女儿”的益希卓玛为推广太阳能资源倾注了她近半生的光阴。而作为一名作家的她,对当代藏族文学的发展同样做出了重大贡献……

太阳的女儿

——回望藏族女作家益希卓玛的一生

■ 吴春岗

她,是新中国的第一位藏族女作家,创造了当代藏族文学的多个第一。

她,一生跌宕起伏,风雨相伴,生命的根始终深埋于民族文化的丰厚土壤。

她,以一生的执着和坚守,书写着民族的心路历程,守望着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。

她,就是藏族女作家益希卓玛。

转眼之间,益希卓玛已离开8年之久。但想到她的故事,依然如仰望星空一样,敬佩至极。

1980年的春天,益希卓玛创作了短篇小说《美与丑》,以藏族放牧员松特、汉族畜牧技术员侯刚和支部书记亦桑三个人为主线,讲述了在新疆细毛羊与藏羊进行杂交改良过程中,出现的问题和因认知不同引发的矛盾冲突和最终握手的故事。小说通过三人关系的微妙变化,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和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和美的意义,展示了藏族人民追求真善美的道德品格。

一年后,益希卓玛又创作出版了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《清晨》,以西藏和平解放为背景,通过描写主人公巴丹的命运转折,揭露了西藏封建农奴制的黑暗与腐朽,揭示了藏族人民反抗剥削和压迫、追求自由解放的历史必然。

益希卓玛的短篇小说《美与丑》和长篇小说《清晨》突破了当时的创作观念和审美取向,具有民族地域特色、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时代风貌。它们引领了当代藏族文学的发展方向,对藏族文学的推动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
回溯往昔,根植在益希卓玛心中那颗写作的种子大概是从小就被父亲埋下了。

1925年,益希卓玛出生在中甘肃省甘南藏

族自治州卓尼县洮南乡的组子村。她的父亲是少有的藏族开明人士,这让她有幸接受了新式教育。益希卓玛从小就展现出对社会的关注和思考,她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动,并在兰州女子初等职业学校接受教育。她阅读了丰富的进步书籍,对劳动人民和社会现实有了更深入的理解。更加深了她对光明和自由的向往。她联系在兰州的藏、汉、回等各民族同乡和同学,成立了以文学写作和思想交流为纽带的文学社团“洮声社”。

“明月下,古殿旁,高耸的松树,沉思的姑娘——她在谋算奔赴抗日战场。”

这是益希卓玛的手抄本诗集《小草集》中的一首,是她最早的诗歌作品,反映了她的少年抱负。这期间,益希卓玛如痴如醉地流连于兰州地区的各图书馆、旧书店、书摊上,凡能找到的书她都阅读。她大量阅读和接触了陀思妥耶夫斯基、高尔基、鲁迅、茅盾等作家的作品。她在文学的原野徜徉,文学的种子在时代的风雨里萌芽。

1946年,益希卓玛考入兰州大学,在西安继续深造。这段时间她接触了中国古典文学,开始对文学产生浓厚的兴趣。1948年,益希卓玛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。在上海,她积极参与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斗争,组织学生运动,并主编刊物。她的文学创作和社会活动在上海得到了培养和锻炼。

益希卓玛回到兰州后,投身于中国共产党推动文化教育事业的浪潮。在不断斗争和奋斗中,她保持着对文学创作的热情,同时积极参与戏剧活动。

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之际,益希卓玛开始在《新中国妇女》杂志编辑部工作。她积极参与妇女宣传工作,并结识了蔡畅、邓颖超等全国妇联的主要领导和前辈。这些老一代革命家廉洁、勤政、务实的精神风范深深影响了益希卓玛。

1950年,益希卓玛参加了中央民族访问团赴西北地区的访问工作。这次难忘的西北之旅让她切身感受到各民族多元文化的绚丽多彩,加深了她对西北各少数民族同胞的了解和热爱,奠定了她坚定走文学创作道路的思想基础。回到北京后,她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,并决定回到大西北追逐她的文学梦。

1952年,益希卓玛来到西安,在《西北文艺》编辑部工作。在那里,她结识了同样在长安县农村扎根的作家柳青。柳青告诉益希卓玛,要想创作出思想深刻、有时代生活气息的作品,就必须长期深入群众生活,与人民大众同呼吸共命运。这些教诲深深启发和鼓舞了益希卓玛。

不久后,益希卓玛回到了兰州,在甘肃日报社和甘肃省文联《甘肃文艺》编辑部工作。这时的甘肃成为国家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建设的重点地区,迎来了发展机遇。益希卓玛在《新观察》上发表了一篇反映白银地区地质探矿的报告文学《山谷里的变化》,引起了毛泽东同志的关注,推动了铜城白银的开发建设。她笔下的“山谷里”,成为新中国第一个有色金属铜的生产基地。

1956年,益希卓玛又走进天祝草原,在那里与藏族姐妹和牧民群众共同生活、劳动,创作了电影剧本《在遥远的牧场上》,反映了草原的发展和共和国新气象。

益希卓玛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,她认

为生活是艺术创作的源泉。为真实细腻地反映牧民草原生活,益希卓玛长期深入黄河首曲的玛曲草原,有三年时间住在牧民的牛毛帐篷里,和牧民一起生产、生活。她和藏族姐妹叙家常,帮她们捡牛粪、打酥油、放牧牛羊、熬茶,分享劳动的艰辛和快乐。长篇小说《清晨》中雨天住帐篷、草地上拾蘑菇、骑牦牛的细节描写,都是她牧区生活的体验和真实写照。

除了文学创作,益希卓玛还积极参与推动社会经济。在她参加1982年的藏族作家座谈会期间,创作了一篇以西藏水电开发为题材的报告文学《日喀则的时代脉搏》,促进了西藏水电开发建设。

在1984年后,益希卓玛倾注了后半生的心血致力于推广太阳能。她撰写了《青藏高原上的太阳房》《人类建筑史上的大革命》系列报告文学,短篇小说《娜珍走向太阳房》,以及《时代的飞跃》等系列科普散文,在甘南草原进行科普宣传,并为甘南太阳能试验基地的立项做出贡献,使甘南草原的太阳能利用和开发建设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。由于益希卓玛在太阳能开发建设这一全新科技领域所做的特殊贡献,她被各族干部群众亲切地誉为“太阳能科普作家”和“太阳的女儿”。

益希卓玛的晚年,尽管受到身体问题的影响,但她仍然持续追逐自己的文学梦。2015年,年过90岁的益希卓玛辞世,她的骨灰被撒入黄河,成为她最后的栖息地。

益希卓玛是一位勇敢坚定的藏族作家,她用笔墨记录了藏族人民奋斗的历史轨迹,守护着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,其作品具有深刻的社会内涵和时代意义。她是太阳的女儿,让藏族文化荣光闪耀。



幸福

妈妈打电话来说,今年又窖了两窖的萝卜和芋头。我一听,不由舌下凹坑,沁出口水。眼前不由闪现出自己小时候下窖掏芋头的场景。那掏出的不仅是一个个芋头,还有那一段段难忘的少年时光……

■ 李星涛

春生夏长,秋收冬藏。小时候,我家冬天窖藏的主要有两样,一是萝卜,二是芋头。萝卜是冬天吃的菜,芋头是冬天吃的饭。

窖藏萝卜很简单,只需要挖一个两米深的圆形洞穴,将切掉缨子的萝卜倒进去,每倒半筐萝卜,撒一层薄沙土。倒到最后半筐萝卜时,萝卜堆里插进扎好的芦苇把子,以供萝卜呼吸,最后拢一丘馒头状的沙土,将洞穴严严实实,芦苇把子露在外面。萝卜就窖好了。

窖芋头比窖萝卜复杂。窖芋头要先挖窖。土台上选择一片较高的地方,挖一个一头宽一头窄的近似长方形的深坑。坑的大小深度取决于芋头的多少。小时候,家里穷困,整个冬天的主食就是芋头。故而,我家的芋头窖挖得又大又深,我跳下去根本就露不出头。

芋头窖挖好了。我自告奋勇地下窖去,将芋头一筐筐接进窖里,轻轻摆放好,目的是不伤到芋头的表皮。芋头娇贵,一旦表皮溃烂,就会发黑变质,而且还会传染给其他芋头。窖里的芋头绝对不能窖得太满,否则会大大影响到芋头的自由呼吸。

芋头放进窖里了,窖边两端的中间部位各砌上一个土坯垛儿。窖口处较高,砌五块土坯,窖尾偏矮,砌两块土坯。垛儿上纵向搭一根扁木,高粱秸秆每一根折成呈六十度的三脚架,横向披放在扁木之上。从窖口到窖尾,三脚架逐渐缩小,到了窖尾,那根做三脚架的高粱秆儿就只需要半米长了。

芋头窖的房色做好了,就可以将取出的土铺盖到房色上去。窖尾封堵严实了,窖口两边的洞口用稻草严严实实地堵上一个,作为进出口的洞口先用稻草虚虚地堵上,一旦地上开始上冻就马上堵严实了。窖好了芋头的芋头窖,远远看去就像是一只敛羽静伏的蝉,朴实美丽,而又祥和温暖。

时间是食物的挚友。芋头躺在窖中并不是呼呼大睡,而是在一边小憩,一边改变着自己。它们体内的淀粉会在呼吸中悄然转化成糖。大雪铺地的寒冬,我们这些孩子,去掉了窖口的稻草,下到窖里,会发现窖里热烘烘的,充满了芋头的甜味。窖里的芋头呢,身上湿润润的,有点红,就像是刚刚出过汗。这时候的芋头煮出来,不仅甘之若饴,而且还可以熬出鲜甜的芋头糖。

妈妈用大麦芽作为熬糖的催化剂。掏上来的山芋削皮洗净,放在大锅里煮熟,然后盛出来,置于一口缸里,用擀面杖捣成糊糊状,再把捣碎的大麦芽倒进去,继续打圈搅动。因为有了大麦芽的催化,芋糊里的糖水就会乖乖地汪出来,聚拢在芋糊糊的表面,亮晶晶的。

熬芋头糖放大麦芽是一道功夫。大麦芽过了,芽尖泛青,熬出的糖就会发苦,而芽嫩了呢,大麦芽又不能很好地起到催化作用。所以,芽大麦芽的时候,妈妈总是将湿润的大麦用纱布包好,放在袜子口袋里焐着,并不时拿出来观看。一旦麦芽喷出嫩白的芽尖,便马上开始熬糖。缸里的糖水和芋糊糊分离后,妈妈就会拿来吊起四角的纱布来回地晃,下放水盆,连汤带水地将芋糊糊舀进去,上下左右摇动,滤下青黑的汁水,这就是液化的芋头糖。

熬糖时,我早早地扯来一大筐的麦草作为燃料。之所以用麦草,而不用劈柴,是因为麦草燃出的火比较温柔,不至于把糖熬糊。妈妈把滤好的汁水舀进锅里,我慢慢添草,橘黄的火苗舔着黑黑的锅底,一股温馨的甜味儿便在屋里静静地荡漾。锅里的汁水开了,妈妈用筷子不停地搅动,搅着搅着,汁水就变稠了,慢慢地吐吐气泡。当锅里的汁液变成糊糊一样时,妈妈便喊妹妹端来摊放一层芋干面的筐,往外挂糖。

妈妈一勺勺舀出来,轻轻地倒在芋头干磨成的面粉上。那糖水不一会儿就凉了,凝固成又软又硬的糖饼。芋头糖的颜色依火候的大小而定,火大了,它颜色就黑一些,火小了,它颜色就黑黑黄黄。但无论是黑是黄,芋头糖都太黏,咬一口,扯半尺不断。

有了芋头糖,妈妈就会在过年的时候制作出许多糕点来。炸好玉米花用融化的芋头糖一沾一压,就变成了玉米糖;炒好的黄豆放进液化的芋头糖里一拌,立马就成了黄豆酥;米花被芋头糖紧紧抱住,就变成了米花团儿。那时候,我喜欢用刀一小块一小块地将芋头糖切下来,虚虚地放进嘴里,用舌头软软地去接触它,让它慢慢化成糖水,再仔细品尝山芋那特有的粉香味儿,身心均沉浸在过年的美妙时光里。

而今,一场寒流汹涌而至。芋头的叶子一夜之间被虐杀得一片焦黑。折断芋头的藤蔓,已流不出白色的汁水,只是一节干枯的管儿。此时,正是萝卜和芋头收获的黄金季节。妈妈打电话来说,今年又窖了两窖的萝卜和芋头。我一听,不由舌下凹坑,沁出口水。眼前不由闪现出自己小时候下窖掏芋头的场景。那掏出的不仅是一个个芋头,还有那一段段难忘的少年时光。

窖藏的冬天

树影

徐建军 摄

心灵舒坊

我家住在东岭下

书,其工程也大矣,其志气也宏焉,搞得出来不?一者我还没有退休,专行此事,不太可能;二者,少小离家,老大没回,对家乡已没那么熟悉,无从下笔,潜意识中也有疑心,担心这本书搞不出来,婉言相拒了。

有多少人对自己村、自家院落很熟悉呢?后来我知道,楚安公分别找了各个院落在外面的“秀才”,叫他们分担撰写自家院落的写作任务,而其他人却跟我一样婉拒了。我以为这事也就是“族老”们临时起个兴,无聊聊个议,多是知难而退,大半无果而终。不想,2023年仲夏,楚安公发来三四十万的村志文稿电子版,厚如红砖,叫我大吃一惊。我不行,自有行者,我无能,自有能者,乡亲们志存高远,脚踏实地,历时三五年搞出来了,真让我佩服。

东岭何以称东岭?铁炉冲何以称铁炉冲?之前,我一点儿概念也无,读了村志,方才明白。原来老家东岭,还是皇帝亲赐的,公元1225年,原任邵州府防御使的赵昫,天降大喜于斯人,召其回朝即皇位,是为宋理宗,他自山那面的资江小溪码头启程,回望客居之地,也生依依难舍之情,拟将此处山形胜,纳入眼底,输入记忆,回望对面上山,脱口而出,“东之岭也,秀之表也”,说的正是大金山脉东之一隅,恰是我地先人之所居。这个说法真与假,难说,赵昫在我们这里留下很多传说是真的,邵阳古称宝庆,即来自宋理宗,他登基后,拟年号曰宝庆。

我一直不知铁炉冲名字何来,读了村志,

很是惊讶,我们院落最早的称呼是六里巷。丘陵起伏,群山环绕,当时是也,古木参天,荫翳蔽日,而这里在清朝那会出产铁,家家户户都炼铁,铁炉高耸,炉火熊熊。外面来买铁的,被山遮雾盖,不知六里巷在何处,乡亲们干脆起名铁炉冲。这让我不禁想起,我曾去我家对面菜园挖土种茄子、辣子,时不时挖出一块铁坨坨,一种冶炼过的非常坚硬的赭红色坨坨,我原来怀疑是当年大炼钢铁的产物,谁知这在清朝,我们院落早已开始了“钢铁产业”。

我对东岭起名有所疑,老家居大金山之东是真的。宋理宗口含天宪曰东岭,是1000多年前,我们祖辈到这里是500年前。原先一直有个疑问,我们祖辈是这里的原住民吗?读了村志,释了疑惑,我们是500多年前从江西迁移来的,老祖宗迁来这里,最先住“老屋场”,后来子息繁衍,开枝散叶,生了五子,各寻周围山郭,各安其家,相距不是太远,也不是太近,形成各自所居的院落,东岭刘家古有五厅六院之说,五行者,开院落之祖也;六院者,分别是老屋场、沿塘冲、龙塘坪、大塘冲、曰盛铺、麦畲里、铁炉冲。后来各有分家,我们铁炉冲又有一支,转到石道冲去了,各院行政区划几经变化,不变的是认祖归宗之心,这是几乎所有中国人都有的中国心。更让祖先无法想到的是,沪昆铁路开通,高铁站落地东岭,名邵阳北站,改变了茅檐低小的农村气象,高楼拔地而起,甚有小城规制了,又专辟移民点,不同地方的人移居东岭,带来了人气,也带来了文化。

诗情话意

回故乡

■ 赵璟

在故乡的风里,只要
有一丝愧疚从心头泛起
替我守着老屋的那些草
就会纷纷跪倒
代我伏地

在故乡,我还看到,多年前
就离开土地的那些谷穗
已颗粒不存。像那把挂在墙上
已锈迹斑斑的镰刀
和我的父亲与母亲

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,唯愿所有的花开
都有目的。所有的叶落,都是去找寻
尚在人世或已不在人世的那些亲人

兀自站在,曾生我养我的黄土地之上
我就像一瓣落英,降于
专供赎罪的庙宇
只是,在我到来之前,佛陀
已化身一枚青果
于红尘之外,去普度红尘

许多年已难见过
年仪式了,春节不再
舞龙舞狮,而读到这里,
一股热流涌将出来,
泪旋眼眶。读村志,
有一种别人无法体验
的感受,也有一种读其
他任何书都不曾有
的心情……

■ 刘诚龙

“绿发寻春湖畔回,万松岭上一枝开。而今纵老霜根在,得见刘郎又独来。”这是苏轼写给他人的,读来好像是给我写的。这里的湖畔貌似老家的山塘,这里的万松岭上,说的恰是老家东岭。人之寻根意识,或谓归属感,越老越发强烈,顽固地要去寻根。很多人曾问我哪里人,我不假思索,答曰:“东岭刘家的。”其实那时,我们铁炉冲整体划到了一个叫“石桥”后来叫“双石”的村里了,我之归属感依然还在“东岭”,正如我常常对人造籍贯,我说我是“新化”的,其实在我出生10多年前,我们乡镇早已划归现在的邵阳了。也就好几年前吧,政府搞了合村运动,拟将我们院子整体划到三溪村去,乡亲们跳将起来,蛮多人号召村人要去上访,非回东岭不可。如乡亲所愿,我们铁炉冲回到了东岭。

这不是行政村的问题,而是认祖归宗之心如火一样,始终燃烧,这是中国人的价值观基因,千里万里,千年万年,回不到根,也要寻到根处。正是合村前后吧,东岭村老支书刘楚安公,打电话叫我回老家去撰写《东岭村志》,让我既惊又愁,暗喜还疑,一个村也要出一本志